

內生化的制度選擇與長期經濟增長：以河北省縣域地區差距為例，1952～1998

遊 五 嶽

(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講師)

李 飛 躍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

張 冬

(香港嶺南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劉 明 興

(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教授)

摘要

帶來經濟持續增長的良好制度往往內生於制度形成的歷史過程，通過挖掘河北省各個縣在抗日戰爭中的革命經歷，我們發現戰爭過程通過影響各個縣政治菁英的實際政治權力，塑造了他們制度選擇的動機和激勵，從而影響了地方的長期經濟增長。並且，由抗戰歷史所塑造的兩個方面實際政治權力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不同的：當由武裝力量和根據地歷史所塑造的地方政治菁英集體行動能力和社會動員能力越強時，經濟的增長績效越好；而如果由上層革命機關分布所塑造的地方政治菁英與上層菁英之間的政治聯繫越緊密時，經濟的增長績效則會變差。

關鍵詞：經濟增長、內生化制度、實際政治權力、歷史過程

* * *

壹、引言

中國大陸持續 30 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以及與之並存的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一直是研究者們想要解釋的重要問題。制度經濟學派傾向於認為，制度，即「形塑人類互動關係的規則約束」，是比創新、規模經濟、教育、資本積累等因素更為根本的增長原因；經濟制度，尤其是產權安排則是經濟繁榮的關鍵（North and Thomas 1973）。但對社會整體更有效率的經濟制度並不總被選擇，因為當一個社會的不同群體的制度偏好存在衝突時，制度選擇的結果往往取決於更具有政治權力群體的偏好。這裡的政治權力，不僅僅包括正式的政治制度安排所賦予的權力「De jure political power」，也包括實際的政治權力「De facto political power」；而一個群體的實際政治權力則被認為取決於它的集體行動能力以及可利用的資源（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5）。

長久以來，識別制度對於經濟增長的影響，都要處理制度的內生性問題，而一些特殊的歷史事件則常常被作為塑造制度安排的外生力量，在識別中被使用。最典型的就西歐的殖民占領對於被殖民國家的制度移植（La Porta et al. 1997, 1998; 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1; Engerman and Sokoloff 1997; Banerjee and Iyer 2005; Dell 2010; Nunn 2009），此外還有革命戰爭對制度安排的突然改變或重建，如法國大革命，東西德的分裂與統一等（Alesina 2007; Acemoglu 2012; Ahlfeldt et al. 2015）。

但是制度的移植往往是有條件的，不同條件決定了制度移植的成本，從而形成了最終所移植制度的差異性。在實證研究中，這些條件也往往用來作為最終所移植制度的工具變量。例如，在致死率高的殖民地，殖民者們移植保護產權、有利於長期經濟增長制度的成本就很高，因此更傾向於建立攫取性的制度（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1）；又如，在土地稟賦和地理條件適合大規模種植全球性貿易作物的地方，殖民者們更容易建立大型種植園並使用奴隸制度，從而逐漸造成了嚴重的經濟與政治不平等，並形成了只保護菁英利益的制度（Engerman and Sokoloff 1997）。

而具體到革命戰爭後新制度的重建，所依賴的條件則更為複雜。這是因為革命戰爭本身的衝突過程和程度會直接影響到制度重建者自身的政治權力結構，從而導致被重建制度的差異。例如，1857 年的印度士兵兵變直接導致了英國政府取代東印度公司成為印度的直接統治者，而英政府自此停止了在印度殖民擴張進程，那些

到 1858 年兵變結束時還沒有被東印度公司吞並的地區因此保存了一定程度的制度自主權（Banerjee and Iyer 2005; Iyer 2010）。

解釋中國大陸當代的經濟增長同樣要回到中共所進行的革命戰爭對制度重建者的政治權力結構、從而對經濟制度的影響。戰爭的衝突過程直接塑造著不同地區革命者們所擁有的政治權力，例如那些在抗日戰爭中建立了穩定武裝根據地的地區，與沒有建立根據地的地區相比，革命者們的集體行動能力和對基層社會的動員能力都要更強；而那些成立過更高層級抗日政權的革命者們會比僅僅建立過基層抗日政權的革命者們所擁有的政治權力更大。

在革命勝利之後，這種革命力量內部的政治權力結構則會以各種正式、非正式的形式延續下來。具體到我們本篇文章所關注的河北省而言，由於河北省在抗日戰爭時期是中共重要的武裝根據地組成部分，並且相對於其他省分解放時間較早，因此解放後，在各地領導或從事革命活動的革命者們除了一部分調至上級政權機構工作外，大部分都留在了本地工作，成為本地的各級領導幹部。但是這些留任幹部所擁有的實際政治權力卻受到本地革命歷史的影響，一方面，那些抗戰中建立的武裝力量越強，根據地越穩固的地區，革命者的民衆基礎越紮實，動員大批人力、武力和財力支援戰爭的能力越強，因而建國後這些留任幹部的影響力也會越大，即集體行動能力和社會動員能力越強；另一方面，那些在抗日戰爭時期建立了更高層級權力機關的地方，比如是軍分區甚至更高層級黨委機構所在地，在建國後這些地方的革命者中就會產生更多的上層領導，如地區一級和省一級的幹部，因此，留在這些地方工作的幹部基於跟上層領導有過的共同革命經歷，也會有更強的上層政治聯繫。

而我們發現，由抗戰歷史所塑造的當地政治菁英在這兩個方面的實際政治權力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不同的：當由武裝力量和根據地所塑造的地方政治菁英集體行動能力和社會動員能力越強時，經濟的增長績效越好；而如果由上層權力機關分布所塑造的地方政治菁英與上層菁英之間的政治聯繫越緊密時，經濟的增長績效則會變差。我們提出的解釋邏輯是，如果本地菁英有強大的集體行動能力和社會動員能力，那麼他們能夠通過集體行動和社會動員來制衡上級管轄、變通上級政策，從而維護本地的經濟利益，地方的產權安排也能得到保障；但如果本地菁英與上層政治菁英的聯繫非常密切，獲取和維持權力主要依賴於上級的庇護和提拔，他們就會缺乏激勵推行保護本地經濟利益的政策以獲得基層菁英和群眾的政治支持，反而他們會有比較強的意願採取汲取性的政策以滿足上級的需求，獲得晉升的資本。

由於中共最重要的革命根據地如晉察冀和晉冀魯豫革命根據地都有一部分在河

北省，河北省可以被認為是受共產革命影響最大的省分之一，選取河北省作為研究重點使我們能夠更好地專注於與研究問題相關的重要案例。另一方面，正是由於這一特點，河北省的共產革命歷史紀錄也相對完善，資料的可得性也使得我們的研究有更為堅實的史實基礎。此外，一省之內在文化傳統、自然資源、地理條件等方面差異都不會很大，研究省內的縣級經濟績效差異，能讓我們發現更加細緻的影響因素和作用機制。

根據對河北省抗日戰爭歷史的梳理，我們構建了本地革命武裝力量，和上層政治資源這兩個指標。具體而言，當一個縣（市）在抗日戰爭期間建立了革命武裝根據地，且在反掃蕩結束後，即 1944 年時存在成建制的抗日武裝力量，或者在該縣主動發起過對日偽軍的武裝進攻，我們就將本地革命武裝力量的虛擬變量設為「1」，否則就設為「0」。而對於上層政治資源，我們則以一個縣（市）在抗日戰爭期間是否是根據地軍分區一級或以上級別的黨委機關所在地來衡量的，如果是，上層政治資源的虛擬變量設定為「1」，否則設為「0」。

在我們的分析框架下，不同的本地革命力量和上層政治資源塑造出了河北經濟增長顯著的地區差異。在河北省的 136 個樣本縣中，有 8 個縣連抗日根據地都沒有建立過，而這 8 個縣在 1970~1998 年的人均工農業增長率只有 6.44%，人均工業增長率只有 25%，遠低於河北省 9.83%，和 29.65% 的平均水準。而在冀東根據地，有 90.48% 的縣不僅建立了抗日根據地，且在我們的定義中，本地革命力量指標取值為 1，即在反掃蕩結束後，存在成建制的抗日武裝力量，或者主動發起過對日偽軍的武裝進攻，高於全省「本地革命力量」取值 84.06% 的均值；同時在冀東根據地，也只有約 28.57% 的縣市成立過軍分區及以上級別的黨委機關，低於全省均值 30% 的水準；但是，在經濟表現上，冀東根據地各縣在 1970~1998 年的人均工農業增長率達到了 16.62%，遠高於其他根據地，人均工業增長率 30.58% 也位於各根據地前列。基於河北縣（市）級革命歷史與長期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證據我們將在文章的第四部分詳細闡述。平均而言，本地革命力量強的縣（市）要比弱的縣（市）在 1952~1998 的人均工農業產值增長率提高 0.7%，而擁有上層政治資源的縣（市）要比沒有上層資源的縣（市）在 1952~1998 的人均工農業產值增長率要降低 0.5%。

本文的寫作除第一部分引言外，分為以下幾個部分：第二部分在討論中國大陸經濟地區發展差異的現有理論的基礎上提出我們的理論假說，第三部分介紹河北省共產革命的歷史和解放後省級政權結構的演變，第四部分用經驗證據來檢驗了我們的假說，最後一部分是本文的結論。

貳、中國大陸地區經濟發展差異的爭論以及我們的假說

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不平衡是中國大陸經濟的顯著特徵。到底是什麼因素導致了區域經濟發展的差異呢？現有文獻提出了幾種不同的解釋。一類文獻將經濟績效的差異歸結為各地區資源稟賦的差異。比如，各地區的物質資本（徐現祥、舒元 2004；周業安、章泉 2008）、人力資本（蔡昉、都陽 2000；鄒薇、周浩 2007；Fleisher et al. 2010；Wang and Yao 2003）、地理位置和基礎設施（Bao et al. 2002；Démurger 2001；Démurger et al. 2002；Fleisher and Chen 1997）方面的差異被認為是地區經濟發展差距的重要原因。但是，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都是內生的，我們還需要理解為什麼有些地區更有激勵去進行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投資。地理因素說也難以解釋沿海地區內部之間的經濟發展差異。另外，初始的人力資本存量和地理特徵這些固定的因素也不能夠完全解釋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差距隨時間的不斷變化。

還有一類文獻強調地區之間初始的經濟結構，如所有制結構（Chen and Feng 2000；Whiting 2001；陳玉宇、黃國華 2006；劉瑞明 2011；王文劍、覃成林 2008）、市場化程度（孫海剛 2007；樊綱、王小魯、朱恒鵬 2003）、金融發展水準（張軍、金煜 2006）等因素。這類文獻注意到了歷史因素對於經濟發展的影響，但是還有待完善。因為這些因素也是內生的，不能從根本上解釋地區間的經濟增長差異。例如，如果所有制結構影響區域經濟增長差距的關鍵因素，我們還必須理解為什麼有些地區在計劃經濟時期獲得了更多的經濟資源從而建立了大量的國有企業，而另一些地區在計劃經濟體系的資源配置中卻被邊緣化，但在改革開放時期少了國有企業各種負擔。

制度經濟學則強調保護產權的制度安排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和動力（North and Thomas 1973；North 1981；1990）。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中國大陸名義上的制度在各地是高度一致的，但各地區實際制度和政策執行上的差異是不可忽視的，這一特徵是理解地方經濟發展差異的關鍵。在「晉升錦標賽」的理解框架下，地方官員為了獲得升遷而有動機以各種方式，如保護產權、吸引外資、調整產業結構等等，來發展地方經濟（Naughton and Yang 2004；Li and Zhou 2005；周黎安 2007；王賢彬、徐現祥 2008；宋凌雲、王賢彬、徐現祥 2013），但是這一理論也只能解釋官員的個人行為，而不是地區經濟的長期差距。同樣的，使用官員個人特徵來解釋經濟增長的文獻（楊海生、羅黨論、陳少凌 2010；張平、趙國昌、羅知 2012；Yao

and Zhang 2015），也不能解釋地區長期差距的存在，因為某個特定地區的官員的個人特徵的變化並不具有長期的一致性。更為重要的是，大部分研究所識別的政治升遷和經濟增長的關係可能是有問題的。有些官員能夠獲得在不同崗位上（包括經濟發達省分）的交流經驗，而這會進一步影響政治升遷的可能性（寇健文 2007；2010）。

因此，我們的解釋側重於討論長期的政治權力結構性特徵，而不是政治領導人的個人特徵，這種由革命衝突所塑造的權力結構在一定時期內的穩定性，通過在建國後持續地構成地方官員制度選擇和政策執行的激勵，形成了地區之間經濟發展的長期差距。

一部分文獻已經注意到了共產革命對中國大陸基層治理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陶鶴山 2002；黃琨 2006；王友明 2006）。不過，上述文獻對革命運動與農村現代化轉型的關係，側重於討論歷史問題，對革命傳統的持久影響分析較少，並沒有建立革命傳統與當代治理水準和經濟發展績效的聯繫。劉雅靈的案例研究在這方面是一個比較好的嘗試，探討了溫州革命歷史的特殊性對其後來私營經濟發展的影響（Liu 1992）。^①她認為，溫州的革命傳統是理解這一現象的關鍵：一方面，溫州本地遊擊隊在解放前一直相對獨立，與高層政治力量相對疏遠，但與本地民眾建立了密切的聯繫；另一方面，地方遊擊隊參與了溫州的解放，並且在解放後地方遊擊隊出身的幹部能夠比較有效地控制本地政權。由於他們與當地群眾的密切關係，因而有動力去執行保護市場的政策。但事實上，本地遊擊隊力量強並且與本地群眾有密切聯繫並不必然會保護產權。大量的革命根據地在後期的經濟發展績效上都差強人意，而一些非革命根據地區域也出現了高速增長（如蘇南地區）。

我們認為，地方幹部是否有激勵保護基層菁英和群眾的利益，推行保護產權、保護市場的推動經濟發展政策，並不完全像劉雅靈所分析的那樣取決於地方遊擊隊與本地群眾之間的關係，而主要取決於地方官員所面對的實際政治權力結構。不可否認，中共在一段時期內政治升遷的制度化程度有所提高（寇健文 2001；趙建民、張鈞智 2006；黃信豪 2010），但是仍長期缺乏制度化的規則，這使得政治菁英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不能完全依靠正式制度來保證政治上的生存（寇健文 2000）。在這種情形下，派系政治是理解實際政治權力結構的關鍵（Nathan 1973；Dittmer 1995；寇健文 2004；Persico et al. 2011）。更強的上級政治關係可以幫助下

註① 龔啓聖和林毅夫對饑荒的分析採取了類似的分析角度（Kung and Lin 2003）。他們的研究認為，由於革命根據地幹部與本地群眾的關係更為密切，因此在大躍進中採取了相對緩和的手段。

級官員獲得政治庇護，同時可以能夠提高他們升遷的機率（Nathan 1973；Shih et al. 2012；Jia et al. 2015；黃信豪 2009；寇健文 2007）。而如果地方官員與上級菁英有緊密的聯繫，他們會有比較強的意願執行上級的政策路線，卻缺少動力去獲取下級的支持，缺乏激勵去推行保護民衆的政策。相反，如果地方官員與上級官僚的關係疏遠，甚至存在衝突，那麼他們就可能在權力競爭中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

②過度汲取經濟資源將會破壞來自群眾和基層幹部對自身的政治支持③，因此，他們會有較強的動力奉行維護本地利益的政策，保護自己在基層的權力基礎；同時，如果他們有較強的集體行動能力和社會動員能力，抵制、變通上層政策以維護本地經濟利益的能力也會越強。而這兩個塑造本地官員的制度選擇、政策執行激勵的要素，都與共產革命所奠定的政治權力結構相關。長期的革命據點一方面塑造了當地革命者的集體行動能力和社會動員能力，當他們在中共建國後留任成為當地官員時，這就成為他們維護本地利益、變通上層政策的前提條件；另一方面，那些在戰爭時期處於中共權力樞紐的地區，造就了建國後的大批中上層官員，當地基層幹部也因之前與他們的共事關係更有可能得到提拔，從而更有激勵去執行汲取性的政策以滿足上級的需要。在下一節中我們可以看到，河北在抗日戰爭時期，形成了大量穩定的中共革命根據地及武裝力量，而建國後很長一段時期的省級菁英則穩定地從省內的幾塊重要根據地的革命歷史和治理過程中產生。

參、河北省的共產主義運動與建國後的政治結構

1920年10月，北平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在李大釗和北平中共黨組織的籌備下，中共唐山、保定、張家口和石家莊的黨組織相繼建立。至1927年4月，河北建立了8個地委，2個特別區工委，2個特別委員會，10個縣委以及143個支部（中共河北省委組織部、中共河北省黨史資料徵集編審委員會、河北省檔案局1990）。1927年4月6日，奉系軍閥闖入蘇聯駐中國大使館並逮捕處決了中共北方區委書記李大釗和數十名共產黨員。同年，晉奉軍閥雙方宣戰，順直省委決定

註② 關於中國大陸的地方政權中控制省委的上層政治菁英與地方政治菁英之間的權力衝突，可以參見陳華升（2008）對廣東省的歷史案例研究。

註③ 地方官員上下級之間並不是單向的委託代理關係，更多的是存在於「相互責任」（reciprocal accountability）的權力結構中，這是因為絕大多數地方官員可以被看做「職務權力型」領導人，需要顧及下級官僚的利益，獲取「推舉人團」（selectorate）的政治支持（寇健文 2006）。

配合秋收起義，在北方地區發動武裝暴動並準備以玉田為暴動的重點地區，但玉田暴動失敗，奉系軍閥還摧毀了中共北平和天津的市委機關。自此，北方的黨組織陷入了混亂的狀態。在土地革命時期的大部分時間內，河北省委與中央的聯繫相對疏遠，有時候甚至被中斷。直到 1936 年北方局改組後，河北省委的工作才開始恢復。在一年多的時間裡，華北地區的黨員發展到了 5 千多人（朱文通、王小梅 2000）。河北省委與中共中央的聯繫也開始變得密切，而隨著抗日根據地的建立，聯繫變得更為緊密。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中共決定在華北地區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八路軍 115 師的主力部隊挺進山東，一部分部隊留守五臺山區並建立了抗日根據地，主要轄區為晉東北和冀西兩部分地區，後來鞏固發展為北嶽抗日根據地。東北軍第 53 軍第 130 師第 691 團改編為人民自衛軍，成為了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人民自衛軍與保定省委領導的地方武裝合編為河北遊擊軍，創建了冀中抗日根據地。石家莊淪陷後，129 師東進縱隊挺進冀南地區，後來逐漸發展為太行抗日根據地。與此同時，以挺進至冀南的 129 師東進縱隊和地方武裝為基礎，冀南抗日根據地逐步形成。

在河北省的北部地方，中共同樣也試圖建立抗日根據地。1938 年初，晉察冀軍區派支隊挺進平西，開闢了平西抗日根據地。1938 年 5 月，八路軍第 4 縱隊挺進冀東地區，開闢冀東抗日根據地，同時還留下了一支武裝，在昌平、密雲、灤平一帶進行遊擊活動，後在冀熱察區黨委和挺進軍的領導下逐步發展了平北抗日根據地。此外，1938 年，位於河北和山東的結合部地區的武裝力量收編入 115 師東進抗日縱隊，形成了冀魯邊抗日根據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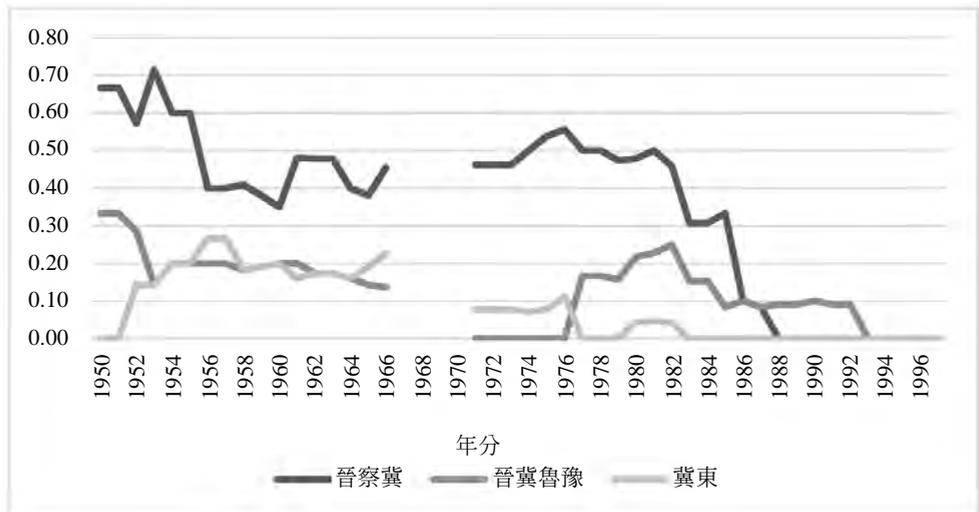
一個地區是否會產生根據地，要取決於多種因素。而本文的一個重要假設則是，根據地的建立外生於初始的經濟發展水準。傳統的觀點認為根據地往往都位於一些貧困的山區，但實際上，大多數貧困山區都不能建立根據地。關於中共在抗日時期根據地的建立，已有文獻強調，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日本和國民黨的相對兵力分布和戰爭形勢，尤其是日軍的占領情況（Johnson 1962；Xu et al. 2018）。而對於一個縣來說，全國戰爭的情況是相對外生的，與當地的經濟發展水準、人力資本、資源稟賦等都是不太相關的。對此，我們在下一節會提供革命根據地建立的外生性的進一步實證證據。

雖然日本軍隊對抗日根據地曾經進行了掃蕩和圍剿，抗戰初期建立的這幾塊抗日根據地比較穩定地延續到了抗戰結束。總的來說，其中，北嶽、冀中、平西和平北等根據地隸屬於聶榮臻領導的晉察冀革命根據地。冀東根據地名義上也屬於晉察冀革命根據地，但由於歷史原因，一直相對獨立。太行和冀南根據地則屬於鄧小平

和劉伯承領導的晉冀魯豫革命根據地。以這幾塊根據地為基礎形成的幾支不同的政治力量深刻地影響到了河北省解放後的政權結構。實際上，河北省省委的權力分配就是幾支不同的政治力量平衡的產物。我們的基本思路是，通過分析歷屆省委常委在抗日戰爭時期的革命經歷來理解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在河北省各個歷史時期中所處的地位以及可能產生的影響。由於冀魯邊根據地產生的省委常委很少，我們以晉察冀、晉冀魯豫和冀東革命根據地的幹部為分析重點。

建國初期，河北省常委會的規模較小，省委常委的人數保持在 6-7 人的規模。在 1950 年至 1951 年間，6 個常委中有 3 人來自晉察冀根據地，2 人來自晉冀魯豫根據地，另外 1 人來自冀魯邊區。到了 1956 年河北省第一屆委員會召開之時，省委常委的人數擴大到了 15 人：其中，晉察冀根據地的幹部有 6 人，占 40%；冀東根據地的幹部有 4 人，占 27%；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幹部有 3 人，占 20%。這樣的權力結構在文革前一直保持穩定，如圖 1 所示，晉察冀根據地常委所占比例大約為 40%，晉冀魯豫和冀東根據地常委各占 20% 左右。而到了 70 年代初，晉察冀根據

圖 1 河北省省委常委革命背景結構變化示意圖（1949~1997）



說明：具體個人信息見附錄 1。1967~1970 年因「文化大革命」省委暫時瓦解沒有數據。

資料來源：根據中共河北省委組織部、中共河北省黨史資料徵集編審委員會、河北省檔案局（1990）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河北省組織史資料（1922~1987）》，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2000）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1921~1997）》以及作者收集的簡歷資料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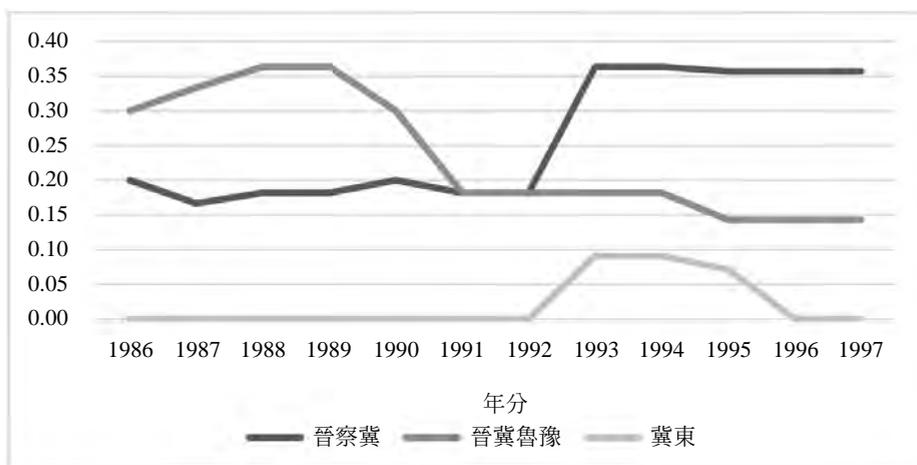
地的幹部在省委中則占據了明顯的優勢，所占比例約為 50%。文革結束後，省委常委結構又發生了很大改變，80 年代初期，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幹部所占比例達到了 25%，而晉察冀根據地幹部所占比例由 50% 降至 30%。與此同時，冀東根據地的省委常委進一步減少。雖然常委內部的結構在發生變化，但我們可以看出，直到 80 年代初期，河北的省級政治權力基本上是由晉察冀和晉冀魯豫這兩個主力革命根據地出身的幹部所掌握的。

80 年代中期之後經過「幹部年輕化」政策和老幹部退休制度的推行，大部分省委常委都是沒有革命經歷的年輕人，但政治結構並不會輕易改變。幹部為了長期的政治生存，都需要不斷培養自己派系的年輕幹部使自身的政治影響能夠持續。尤其是在建國初期，土改、反右、大躍進、四清等歷次政治運動讓各級幹部受到競爭對手打壓迫害的風險非常大，加之幹部跨區域的流動性較低，就使得這些幹部們必須不斷培植自己在當地的政治力量，維繫自己的權力基礎。80 年代的「幹部年輕化」中提拔起來的年輕人事實上就多為原先老幹部所培養，這些年輕幹部很大程度繼承了老幹部之前的政治關係網絡，就使得早期的政治權力結構能夠產生長期的政策影響。

我們接下來考察沒有革命經歷的、1986~1997 年間任職的省委常委，並用他們升任到市一級領導幹部前的經歷來識別他們所屬的政治力量。例如，如果一個省委常委在他升任到市一級領導崗位前在晉察冀根據地的某個縣（市）工作，那麼他就屬於晉察冀根據地的幹部。^④如圖 2 所示，新一代的省委常委中（沒有革命工作經歷的幹部），晉冀魯豫和晉察冀的幹部此消彼長，而冀東根據地幹部仍居少數。我們依然看出，即使本地革命老幹部已經從省委中退出，河北省委常委依然主要由在原各主力根據地地區工作的幹部升任，他們占據了省委常委的大半席位。可以說，在建國後的長期時間內，革命戰爭所塑造的政治權力結構一直都在影響著河北的上層政治，也影響著地方政權與上層菁英之間的穩定關係，而這正是我們研究的前提條件。

註④ 不過，如果一個省委常委已經升任某個地區的市級領導幹部，再調入其他地區任職，那麼他將不被算作所調入地區的政治力量。

圖 2 河北省省委常委工作背景結構變化示意圖（1986~1997）



資料來源：根據中共河北省委組織部、中共河北省黨史資料徵集編審委員會、河北省檔案局（1990）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河北省組織史資料（1922~1987）》，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2000）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1921~1997）》以及作者收集的簡歷資料整理。

而河北省建國後長期的省委權力結構從抗戰時期的中共黨委分布也可見一斑，在我們的文章中，我們定義，當一個縣（市）在抗日戰爭期間是根據地軍分區一級或以上級別的黨委機關所在地時，其「上層政治資源」的虛擬變量設定為「1」，否則設為「0」，這是因為軍分區及以上級別的黨委機關所在地會產生更多的地區級、省級領導。表 1 按照晉察冀、晉冀魯豫、冀東根據地的劃分，統計了河北省內各大根據地建立了的軍分區及以上級別的黨委機關的縣（市）的個數，及其全省範圍內建立了軍分區及以上級別黨委機關的縣（市）個數。我們同樣可以看出，大多數的上層黨委機關仍然是分布在晉察冀、晉冀魯豫地區。

表 1 河北省抗日戰爭時期軍分區及以上級別黨委機關分布

地區	「上層政治資源=1」的縣（市）個數
晉察冀根據地	19
晉冀魯豫根據地	13
冀東根據地	6
河北全省	42

資料來源：中共河北省委組織部、中共河北省黨史資料徵集編審委員會、河北省檔案局（1990）。

肆、實證檢驗

一、模型設定及資料來源

(一) 被解釋變量

爲了檢驗我們的假說，我們分別選取了 1952 年、1957 年、1965 年、1970 年以及 1978 年到 1998 年的人均工農業總產值的年均增長率以及 1978 年至 1998 年的人均 GDP 增長率作爲被解釋變量。河北省各縣市從 1978 年開始才有人均 GDP 的統計，我們主要使用人均工農業總產值來衡量河北省各縣長期的經濟發展水準，並分別以不同的年分作爲增長率計算的起點，這樣一方面比較穩定地刻畫了各縣長期的經濟增長軌跡，另一方面也考慮到了不同歷史時期經濟增長可能存在的不同特點。同時，由於文革是對原有政權結構的一次衝擊，我們也將 1952 到 1965 年的人均工業總產值的年均增長率單獨列出來作爲被解釋變量，與 1965 年之後的增長作爲對比，比較實際政治權力結構在文革前後的不同影響。以這 7 個被解釋變量爲基礎，我們建立了 7 個 OLS 回歸模型。各時期人均工農業生產總值以及人均 GDP 增長率由《新河北五十年：1949~1999》所提供的相關資料計算得到。我們將各年分的人均工農業總產值和人均 GDP 統一換算爲 1998 年的價格。

(二) 解釋變量

根據《中國共產黨河北省組織史資料（1922~1987）》以及河北各縣（市）在上世紀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編纂的地方誌中《大事記》的記載，我們構建了衡量河北省各個縣在抗日戰爭時期「本地革命力量」和「上層政治資源」的兩個虛擬變量，作爲塑造建國後各縣政治菁英的實際政治權力的指標。具體而言，當一個縣（市）在抗日戰爭期間建立了革命武裝根據地，且在反掃蕩結束後，即 1944 年時存在成建制的抗日武裝力量，或者在該縣主動發起過對日偽軍的武裝進攻，我們就將「本地革命力量」的虛擬變量設爲「1」，否則就設爲「0」。「本地革命力量」越強，它所塑造的地方政治菁英在建國後的集體行動能力和社會動員能力也越強；同時我們定義，當一個縣（市）在抗日戰爭期間是根據地軍分區一級或以上級別的黨委機關所在地，「上層政治資源」的虛擬變量設定爲「1」，否則設爲「0」。由於軍分區以上級別的黨委機關所在地會產生更多的地區級省級領導，因而本地幹部與上層菁英的聯繫也會更緊密。

(三) 控制變量

控制變量主要有兩方面內容，包括初始的經濟指標和地理變量。在初始經濟指標方面，對於不同時期人均工農業總產值增長率的回歸，我們分別控制各期期初的人均工農業總產值，即各縣市 1952 年、1957 年、1965 年、1970 年和 1978 年的人均工農業總產值；對於 1978 年至 1998 年人均 GDP 的增長率回歸，我們則控制了各縣市 1978 年人均 GDP。與被解釋變量的資料來源相同，相關資料來自《新河北五十年：1949~1999》，價格均統一調整為 1998 年的價格。同時，我們還控制了 1952 年時人口（16 歲及以上）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口規模和人均耕地面積。這些期初的人力資本、農業資源稟賦都有可能影響長期的經濟增長。其中教育年限的數據來自 1990 年人口普查 1% 抽樣的推算，人口規模和耕地面積同樣來自《新河北五十年：1949~1999》。同時，考慮到一些少數民族自治縣的特殊情況可能會對經濟增長產生的長期影響，我們控制了各個縣漢族人口的比例，由於沒有更早的數據來源，在這裡我們使用的 1990 年全國人口普查時的結果，但 1990 年之前人口的遷移非常有限，民族構成的變化也不大，因此並不太會影響我們的估計結果。

在地理因素的方面，我們主要控制平均海拔、是否沿海、是否位於鐵路沿線、15 度以下平地面積比例、到北京的距離以及到天津的距離等地理變量，這些資料來自作者收集的地理資訊數據庫。表 2 是回歸中各個變量的描述統計結果。

表 2 描述統計結果

變量名	觀測值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釋變量					
1952~1998 年人均工農業總產值指數增長率 (%)	114	5.82	1.49	2.29	10.73
1952~1998 年人均工業總產值指數增長率 (%)	127	15.09	3.45	8.01	27.10
1952~1965 年人均工農業總產值指數增長率 (%)	114	-1.40	2.43	-7.47	4.68
1952~1965 年人均工業總產值指數增長率 (%)	127	8.97	10.14	-6.49	45.59
1957~1998 年人均工農業總產值指數增長率 (%)	119	6.32	1.58	2.40	11.29
1957~1998 年人均工業總產值指數增長率 (%)	131	14.46	2.73	8.47	24.01
1965~1998 年人均工農業總產值指數增長率 (%)	123	8.84	1.92	2.54	13.40
1965~1998 年人均工業總產值指數增長率 (%)	137	17.89	2.99	11.30	27.92
1970~1998 年人均工農業總產值指數增長率 (%)	119	9.83	2.09	3.17	13.80
1970~1998 年人均工業總產值指數增長率 (%)	137	29.65	5.39	17.27	45.74

變量名	觀測值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1978~1998 年人均工農業總產值指數增長率 (%)	138	11.10	2.57	4.26	17.12
1978~1998 年人均工業總產值指數增長率 (%)	138	17.28	3.67	5.85	29.81
1978~1998 年人均 GDP 指數增長率 (%)	138	10.92	1.78	5.95	15.18
1990 年財政收入占 GDP 比值 (%)	138	6.10	2.33	2.80	18.65
1990 年非國有企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比例 (%)	138	73.60	15.64	1.92	96.30
解釋變量					
本地革命力量虛擬變量	138	0.84	0.37	0	1
上層政治資源虛擬變量	138	0.30	0.46	0	1
初始經濟社會變量					
1952 年人口規模 (萬人)	136	22.02	9.15	5.58	62.71
1952 年人均耕地面積 (公頃 / 萬人)	136	2543.33	1218.02	970.70	9940.39
1952 年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136	1.95	0.84	0.52	5.34
1952 年人均工農業總產值 (元, 98 年不變價格)	114	875.32	477.51	303.06	3883.28
1952 年人均工業總產值 (元, 98 年不變價格)	127	22.69	35.22	0.17	359.86
1957 年人均工農業總產值 (元, 98 年不變價格)	119	969.88	502.43	297.32	4047.27
1957 年人均工業總產值 (元, 98 年不變價格)	131	45.06	45.46	2.43	368.52
1965 年人均工農業總產值 (元, 98 年不變價格)	123	716.82	345.26	280.67	2493.91
1965 年人均工業總產值 (元, 98 年不變價格)	137	48.75	50.10	1.56	338.56
1970 年人均工農業總產值 (元, 98 年不變價格)	119	849.98	351.31	291.03	2488.61
1970 年人均工業總產值 (元, 98 年不變價格)	137	90.45	72.37	11.90	430.06
1978 年人均工農業總產值 (元, 98 年不變價格)	138	1377.34	440.35	512.71	3132.77
1978 年人均工業總產值 (元, 98 年不變價格)	138	357.73	194.06	52.37	1191.84
1978 年人均 GDP (元, 98 年不變價格)	138	739.15	232.22	238.00	1561.00
其他控制變量					
平均海拔 (米)	138	254.09	402.63	3.00	1497.00
平地面積比例 (%)	138	62.44	33.37	2.67	97.75
是否沿海 (1= 是, 0= 否)	138	0.06	0.23	0.00	1.00
到北京距離 (千米)	138	226.11	94.89	46.65	434.90

變量名	觀測值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到天津距離（千米）	138	223.74	90.12	67.72	419.51
是否位於鐵路沿線（1= 是，0= 否）	138	0.26	0.44	0.00	1.00
1990 年漢族人口占比（%）	138	95.86	12.57	33.31	99.99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由於本文的一個重要假設是，抗日根據地的建立以及黨委機關所在地是與經濟發展無關的外生衝擊，也就是說，它們只能通過影響地方的非正式權力結構而影響經濟發展。爲了檢驗這一假設，我們在附錄 3 中分別將文中所構建的本地革命力量和上層政治資源兩個指標對 1952 年的人均工農業總產值（取對數）做了回歸。雖然檢驗外生性更好的方法可能是對 1937 年之前的經濟發展水準進行回歸，但是因爲民國時期缺乏縣級的經濟統計數據，同時考慮到從抗戰到建國初期經濟增長非常有限，我們代之以與 1952 年經濟發展水準相關性的回歸，同時控制的有 1952 年的人均受教育年限，1952 年的人口（取對數），1952 年的人均耕地面積（取對數），以及主回歸裡的相關地理等變量。我們發現，本地革命力量和上級黨委機關這兩個指標與建國初期的經濟發展水準、人力資本積累都沒有顯著相關性。

二、估計結果及說明

表 3 報告了以本地革命力量和上層政治資源兩個虛擬變量指標作爲解釋變量的估計結果。在模型 1 中，被解釋變量爲 1952~1998 年人均工農業生產總產值指數增長率，在控制了 1952 年初始的經濟社會變量和其他控制變量的情況下，地方革命力量虛擬變量在 1% 的顯著性水準下顯著，並對被解釋變量有正向的影響，上層政治資源虛擬變量，在 5% 的顯著性水準下顯著，並對被解釋變量有負向的影響。這說明，對於河北省 113 個樣本縣市而言，一個地區的本地革命力量有助於保護本地經濟利益，提高經濟績效，而上層政治資源則對經濟績效有負面的影響。我們還可以看到，平均海拔在 5% 的顯著性水準下對被解釋變量有負向的影響。也就是說，地處平原對長期的經濟增長有積極的影響。另外，是否沿海，距離北京和天津的距離等區位因素在模型中並不顯著，即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前提下，這三個因素在長期中對經濟績效的影響相對較小。對於初始的經濟社會變量而言，人口規模和人均耕地面積這兩個控制變量均在模型中不顯著，而 1952 年人均工農業總產值則在 1% 的顯著性水準下顯著，並對被解釋變量有負向的影響。換言之，河北各縣市

表 3 OLS 回歸分析結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1952~1998 年人均 工業總產 值增長率	1957~1998 年人均 工業總產 值增長率	1965~1998 年人均 工業總產 值增長率	1970~1998 年人均 工業總產 值增長率	1978~1998 年人均 工業總產 值增長率	1978~1998 年人均 GDP 增長率	1952~1965 年 人均工業總 產值增長率
實際政治權力結構	0.724*** (0.266)	0.810*** (0.263)	1.027*** (0.325)	2.196*** (0.616)	2.239*** (0.486)	1.413*** (0.457)	1.136 (0.711)
本地革命力量虛擬變量	-0.510** (0.198)	-0.573*** (0.218)	-0.657** (0.269)	-1.428*** (0.495)	-1.101*** (0.386)	-0.992*** (0.313)	-0.147 (0.390)
上層政治資源虛擬變量							
初始經濟社會指標							
初始經濟水準 (元, 對數)	-2.066*** (0.274)	-1.900*** (0.304)	-2.321*** (0.299)	-3.397*** (0.637)	-1.189* (0.636)	-1.699*** (0.588)	-2.468*** (0.503)
1952 年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0.141 (0.092)	0.173* (0.097)	0.235* (0.121)	0.301 (0.224)	0.239 (0.167)	-0.154 (0.141)	0.302 (0.267)
1952 年人均耕地面積 (公頃 / 萬人, 對數)	0.006 (0.271)	0.013 (0.313)	0.010 (0.389)	-0.031 (0.787)	-0.590 (0.526)	-0.786 (0.517)	-0.603 (0.773)
1952 年人口規模 (萬人, 對數)	0.242 (0.295)	0.102 (0.308)	0.147 (0.407)	0.573 (0.789)	0.519 (0.511)	0.501 (0.385)	-0.196 (0.571)
其他控制變量							

平均海拔 (米, 對數)	-0.691** (0.286)	-0.868** (0.344)	-1.105*** (0.418)	-2.064** (0.827)	-1.207*** (0.461)	-0.365 (0.368)	1.659** (0.663)
	0.388 (0.398)	0.074 (0.438)	0.319 (0.573)	0.765 (1.095)	0.027 (0.749)	-0.029 (0.586)	0.035 (0.697)
到北京的距離 (千米, 對數)	-0.206 (0.587)	0.051 (0.654)	0.152 (0.812)	-0.169 (1.622)	0.569 (1.053)	-0.223 (0.923)	-3.454** (1.372)
	0.293 (0.223)	0.280 (0.245)	0.317 (0.297)	0.223 (0.540)	0.067 (0.424)	0.233 (0.351)	0.148 (0.433)
是否位於鐵路沿線 (1 = 是, 0 = 否)	0.167 (0.354)	0.121 (0.400)	-0.145 (0.518)	-0.404 (0.940)	-0.297 (0.779)	0.470 (0.652)	1.897** (0.846)
	-0.025* (0.013)	-0.029* (0.015)	-0.037** (0.018)	-0.071** (0.035)	-0.029 (0.021)	-0.003 (0.016)	0.053** (0.027)
平地面積比例 (%)	0.015* (0.008)	0.011 (0.009)	0.016 (0.011)	0.024 (0.021)	0.018 (0.019)	0.002 (0.016)	-0.011 (0.016)
	113	117	120	116	134	134	113
R ²	0.635	0.555	0.532	0.497	0.437	0.328	0.393

說明：1. 括號內為異方差穩健的 t 統計量；2. * 表示在 10% 水準上顯著，** 表示在 5% 水準上顯著，*** 表示在 1% 水準上顯著；3. 初始經濟水準分別對應

1952、1957、1965、1970、1978 年人均工農業總產值，1978 年的人均 GDP，1952 年人均工農業總產值。

資料來源：詳見「實證檢驗」第一節「模型設定及資料來源」。

在 1952 年到 1998 年的經濟增長中實現了有條件收斂。

從模型 2 到模型 5，被解釋變量分別為 1957 年、1965 年、1970 年和 1978 年到 1998 年人均工農生產總值的指數增長率，我們可以看到，解釋變量在這幾個模型中都顯著，並且估計係數呈逐漸提高的趨勢。作為對照，在模型 7 中，我們的被解釋變量是 1952~1965 年的人均工農業總產值增長率，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本地革命力量和上層政治資源解釋變量在文革開始之前都對經濟增長沒有顯著的解釋能力。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絕大部分經濟資源都依賴於國家的分配，上層政治資源雖然會加劇汲取效應，但是也會帶來更多的經濟資源配置，所以對經濟增長的效應並不確定；而本地革命力量強的地方，本地幹部雖然有保護本地經濟利益的能力，但在計劃經濟體系下所能發揮的主動性也相對有限，所以回歸係數雖然為正但也不是特別顯著。文革衝擊了計劃經濟體系，經濟分權逐漸形成。許多研究已經注意到了經濟分權實際上在 1960 年代末至 1970 年代初就已經出現，並且為中國大陸經濟增長提供了宏觀上的條件（Xu 2011；Donnithorne and Lardy 1976；Donnithorne 1972；Oksenberg and Tong 1991）。在經濟分權的條件下，上層直接分配資源的權力弱化了，本地幹部保護本地經濟利益的動機和能力也更可能轉化為經濟發展的成果。改革開放後的經濟發展則是這一時期經濟增長的延續和發展。模型 5 對 1978~1998 期間，即改革開放後的經濟增長進行了解釋，地方革命力量虛擬變量和上層政治資源虛擬變量都在 1% 的顯著性水準下顯著，其中抗日戰爭期間本地革命力量強的地區人均工業生產總值增長率比革命力量弱的地區年均高 2.2%；建立了總部機關的地區的人均工業生產總值增長率比其他地區低大約 1.1%。而因為 1978 年之後有了 GDP 的相關統計資料，我們又以 1978~1998 年人均 GDP 指數增長率為被解釋變量構建了模型 6。同樣，我們的解釋變量依然顯著，並且符合我們的理論預期。

此外，我們在附錄 2 中，為了對實際政治權力結構的兩個指標進行穩健性檢驗，還將表 3 的模型 1 到模型 5 中的被解釋變量替換成相應時期的人均工業總產值的增長率，而控制的初始經濟水準也替換為相應初始期的人均工業總產值，解釋變量和其他控制變量保持不變。我們可以發現，本地革命力量的影響仍然在各期都顯著為正，而上層政治資源的影響也都顯著為負，說明我們解釋變量的解釋力對於工業在這一時期的發展仍然存在，並且，從係數可以看出影響程度要比對工農業總產值增長率的影響程度更大。

三、機制的檢驗

財政汲取和對非國有產權的保護，作為實際政治權力結構影響經濟增長績效的管道將在這裡進行探討。如前所述，與上層菁英更強的非正式關係可以幫助下級官員獲得政治庇護，同時可以能夠提高他們升遷的機率，所以他們會有比較強的意願執行上級的政策路線，汲取地方資源的激勵就會更高一些，保護地方經濟長期發展的激勵也會更低。相反，如果地方官員與上級官僚的關係疏遠，那麼他們就可能在權力競爭中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過度汲取經濟資源將會破壞來自群眾和基層幹部對自身的政治支持；而如果他們有較強的集體行動能力和社會動員能力，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抵制汲取政策，保護地方產權和市場，維護本地的長期經濟利益。

我們在這裡選取了兩個指標來檢驗這一影響管道：一是財政收入與 GDP 的比值，這衡量了政府收入在社會產出中的比重，是汲取程度的直接測度；二是非國有企業的工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例，這衡量了非國有產權企業的發育水準，從側面反映了地方幹部對非國有產權的保護程度。由於 90 年代後期國有企業經歷了大規模的私有化改革，指標的波動非常大，所以兩個指標，我們都選擇了它們在 1990 年時的水準，此時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幾乎還沒有開始。表 4 給出了政治權力結構對這兩項指標影響程度的 OLS 回歸結果。這兩項數據的計算來自河北省 1990 年的統計年鑑數據，數據的描述性統計情況我們也放在了表 2 中。

對於 1990 年財政收入占 GDP 比值的回歸，初始經濟水準指標在模型 1 和模型 2 中我們分別選擇了 1952 年的人均工農業總產值和 1978 年的人均 GDP，可以看到政治權力結構指標的回歸結果並不會受到初始經濟水準選擇的明顯影響，上層政治資源始終對這一汲取程度的衡量指標有正向顯著作用，而本級革命力量的影響卻始終有負向顯著的作用；同樣的，對於 1990 年非國有企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例的回歸，初始經濟水準指標在模型 3 和模型 4 中我們也分別選擇了 1952 年的人均工業產值和 1978 年的人均工業產值，可以看到，本地革命力量始終對這一非國有產權發育程度的指標有正面顯著的作用，上層政治資源的影響卻不顯著。

表 4 機制的檢驗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1990 年財政收入占 GDP 比值 (%)	1990 年財政收入占 GDP 比值 (%)	1990 年非國有企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比例 (%)	1990 年非國有企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比例 (%)
本地革命力量	-1.944*** (0.533)	-2.082*** (0.588)	6.012** (2.860)	6.242** (2.801)
上層政治資源	1.038*** (0.392)	1.018** (0.389)	-1.732 (1.682)	-2.262 (1.749)
初始經濟社會指標				
初始經濟水準 (元, 對數)	0.107 (0.121)	0.479 (0.539)	-2.284*** (0.568)	4.822 (3.828)
1952 年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0.356 (0.365)	0.333 (0.362)	0.337 (1.025)	0.315 (1.016)
1952 年人均耕地面積 (公頃/萬人, 對數)	-0.352 (0.648)	-0.532 (0.650)	0.966 (3.649)	1.752 (3.687)
1952 年人口規模 (萬人, 對數)	-0.802* (0.405)	-1.109** (0.434)	6.234** (2.430)	5.007** (2.146)
其他控制變量				
平均海拔 (米, 對數)	0.153 (0.467)	0.062 (0.509)	-7.672** (3.447)	-7.423** (3.578)
到北京的距離 (千米, 對數)	1.956** (0.866)	1.624** (0.807)	-0.665 (4.543)	1.501 (4.099)
到天津的距離 (千米, 對數)	-3.565*** (1.069)	-3.158*** (1.068)	10.038 (7.399)	6.888 (7.551)
是否位於鐵路沿線 (1 = 是, 0 = 否)	0.897** (0.445)	0.770* (0.426)	-0.325 (2.260)	-1.835 (2.307)
是否沿海 (1 = 是, 0 = 否)	-0.212 (0.990)	0.553 (1.126)	-13.465** (6.175)	-14.546** (6.111)

平地面積比例 (%)	-0.038*	-0.036*	-0.027	-0.032
	(0.020)	(0.021)	(0.133)	(0.138)
漢族人口比例 (%)	0.039**	0.033*	-0.014	-0.033
	(0.018)	(0.017)	(0.062)	(0.065)
觀測值數	125	134	125	134
R2	0.369	0.384	0.605	0.582

說明：1. 括號內為異方差穩健的t統計量；2. *表示在10%水準上顯著，**表示在5%水準上顯著，***表示在1%水準上顯著；3. 初始經濟水準分別對應1952年人均工農業產值、1978年人均GDP、1952年人均工業產值和1978年人均工業產值。

資料來源：詳見「實證檢驗」第一節「模型設定及資料來源」。

伍、結論

本文的研究認為，中國大陸各地區不同的革命衝突過程塑造了建國後的實際政治權力結構，進而影響了地方政治菁英對於經濟制度和政策的選擇動機和執行能力，並引致了經濟增長的差異。具體而言，河北省各地區由於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歷史不同，當由武裝力量和根據地的強弱所塑造的地方政治菁英集體行動能力和社會動員能力越強時，經濟的增長績效越好；而如果由上層權力機關分布所塑造的地方政治菁英與上層菁英之間的政治聯繫越緊密時，經濟的增長績效則會變差。革命歷史所塑造的實際政治權力結構就有較強的路徑依賴效應，深刻地影響了各地區長期的經濟發展績效。這一分析視角也可以解釋中國其他省分內部的地區經濟發展差異。例如，浙江省的溫州（浙南遊擊隊的根據地）、山東的臨沂（山東縱隊的根據地）、福建的泉州（閩中遊擊隊的根據地）、廣東的東莞（東江縱隊的根據地）。這些相對於本省其他縣市經濟發展非常成功的地區，在解放後的歷史上本地幹部與省委強勢幹部之間都相對疏遠。

我們的文章豐富了一系列關於歷史上的事件對經濟發展的長期遺產的研究，而且闡釋了歷史事件通過對政治權力結構的影響，作用於制度選擇，從而影響經濟增長這一機制。同時，不同於識別制度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研究中，強調制度重建的差異化歷史條件影響了制度重建的成本、從而造成了所重建制度差異，我們的研究關注到了制度重建本身的歷史過程，這一過程改變了重建者自身的政治權力結構，從而造成了所重建制度的不同。我們的研究也發展了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對於

政治權力結構如何影響經濟績效的討論。目前許多解釋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發展差異的文獻還不能夠有效地處理內生性問題，本文將共產主義革命這一歷史因素視作一個外生的衝擊，並探討這一衝擊對實際政治權力結構和長期經濟增長績效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處理了內生性的問題。但是我們深知，全面系統地理解政治權力結構和經濟發展的確還需要做很多工作，希望本文是拋磚引玉吧。

* * *

(收件：104 年 1 月 31 日，接受：108 年 4 月 18 日)

附錄 1 河北省歷屆省委常委主要工作經歷（1949~1990）

時期	省委常委			
河北省第一屆委員會 (1949.5~1956.7)	林鐵	馬國瑞	楊秀峰	孫毅
	(北嶽區和冀中區)	(冀魯邊區)	(冀南區)	(冀中區)
	羅玉川	薛迅	金城	王光華
	(冀中八分區)	(冀南區)	(冀中七、八、十區)	(冀南區)
	王奇才	穀雲亭	王之	阮泊生
	(冀中九分區)	(冀東區)	(冀中十分區)	(北嶽一分區)
	胡開明	閻達開	張承先	張明河
	(北嶽區)	(冀東十七分區)	(冀魯豫區)	(新四軍)
	馬力	趙一民	裴仰山	尹哲
	(冀東十四分區)	(冀南六分區)	(冀東十五分區)	(冀中九分區)
	劉洪濤	李子光		
河北省第一屆委員會 (1956.7~1966.5)	林鐵	馬國瑞	楊秀峰	張承先
	(北嶽區和冀中區)	(冀魯邊區)	(冀南區)	(冀魯豫區)
	穀雲亭	阮泊生	胡開明	王奇才
	(冀東區)	(北嶽一分區)	(北嶽區)	(冀中九分區)
	趙一民	裴仰山	尹哲	劉洪濤
	(冀南六分區)	(冀東十五分區)	(冀中九分區)	(冀中七分區)
	李子光	張明河	馬力	劉子厚
	(冀東十四區)	(新四軍)	(冀東十四分區)	(鄂豫邊)
	吳硯秋	萬曉塘	解學恭	李耕濤
(簡歷缺失)	(冀魯豫區)	(120 師洪趙縱隊)	(北嶽區)	

時期	省委常委			
	王亢之	王道邦	楊英傑	鄧辰西
	(冀中七分區)	(冀中九分區)	(外調)	(太行區山西部分)
	王路明	王笑一	朱子強	杜新波
	(冀中八分區)	(冀魯豫二十三區)	(冀中區)	(冀中七、八分區)
	穀小波	郝田役	肖思明	趙武城
	(冀中七、八分區)	(冀南三分區)	(北嶽一、三分區)	(晉冀豫一、三分區)
	楊一辰	胡昭衡	李頡伯	馬輝
	(山東分局)	(晉綏軍區)	(中央軍委)	(北嶽一分區)
	曾美			
河北省革委會核心小組 (1968.3~1971.5)	李雪峰	劉子厚	馬輝	鄭三生
	(太行區)	(鄂豫邊)	(北嶽一分區)	(北嶽一分區)
河北省第二屆委員會 (1971.5~1976.10)	劉子厚	鄭三生	馬輝	劉海清
	(鄂豫邊)	(北嶽一分區)	(北嶽一分區)	(115 師)
	馬傑	呂玉蘭	馬力	曾美
	(山東軍區)	(勞動模範)	(冀東十四分區)	(北嶽二分區)
	王金山	趙江	袁捷	穀奇峰
	(冀中八分區)	(冀中七、九分區)	(新四軍)	(綏遠)
	郭志	尹哲	王常柏	王世惠
河北省第二屆委員會 (1976.10~1979.12)	(冀中七分區)	(冀中九分區)	(冀中八分區)	(無革命經歷)
	劉子厚	馬輝	呂玉蘭	馬力
	(鄂豫邊)	(北嶽一分區)	(勞動模範)	(冀東十四分區)
	曾美	王金山	穀奇峰	郭志
(北嶽二分區)	(冀中八分區)	(綏遠)	(冀中七分區)	

時期	省委常委			
	尹哲	楊澤江	劉英	張承先
	(冀中九分區)	(冀魯豫區)	(冀中八分區)	(冀魯豫區)
	李永進	嶽宗泰	王玉	邢安民
	(無革命經歷)	(晉中三地委)	(冀中六分區)	(冀中六分區)
	徐純性	洪毅	蘭凱民	江一真
	(平北區)	(平北區)	(簡歷缺失)	(北嶽區)
	王錚	趙一民	裴仰山	陸治國
	(太行區)	(冀南六分區)	(冀東十五分區)	(北嶽區)
	張克讓	王克東		
	(冀中區)	(冀魯豫山東部分)		
(1979.12~1982.6)	金明	江一真	王錚	郭志
	(新四軍)	(北嶽區)	(太行區)	(冀中七分區)
	尹哲	趙一民	裴仰山	呂玉蘭
	(冀中九分區)	(冀南六分區)	(冀東十五分區)	(文革勞模)
	楊澤江	劉英	嶽宗泰	馬輝
	(冀魯豫區)	(冀中八分區)	(晉中三地委)	(北嶽一分區)
	王玉	王克東	蘭凱民	邢安民
	(冀中六分區)	(冀魯豫山東部分)	(簡歷缺失)	(冀中六分區)
	李永進	陸治國	張克讓	洪毅
	(無革命經歷)	(北嶽區)	(冀中區)	(察北專署)
	徐純性	曾美	李爾重	王東寧
	(平北區)	(北嶽二分區)	(冀南區)	(冀南四、六分區)
	曹幼民	劉秉彥		
(太行區)	(冀中九、十區)			

時期	省委常委			
(1983.3~1985.5)	高揚	張曙光	邢崇智	高占祥
	(太行區)	(冀中八分區)	(太行區)	(外調)
	解峰	李鋒	費國柱	葉連松
	(北嶽一分區)	(北嶽一分區)	(冀中九分區)	(無革命經歷)
	呂傳贊	曲維鎮	楊澤江	白石
	(無革命經歷)	(無革命經歷)	(冀魯豫區)	(無革命經歷)
	徐純性			
(平北區)				
河北省第三屆委員會 (1985.5~1990.7)	邢崇智	張曙光	高占祥	解峰
	(太行區)	(冀中區)	(外調)	(北嶽區)
	李鋒	費國柱	葉連松	呂傳贊
	(北嶽區)	(冀中區)	(無革命經歷)	(無革命經歷)
	曲維鎮	白石	劉榮惠	陳玉傑
	(無革命經歷)	(無革命經歷)	(無革命經歷)	(無革命經歷)
	張超	李文珊	嶽岐峰	李海峰
	(簡歷缺失)	(無革命經歷)	(無革命經歷)	(無革命經歷)
	韓立成	程維高		
(無革命經歷)	(無革命經歷)			

資料來源：根據中共河北省委組織部、中共河北省黨史資料徵集編審委員會、河北省檔案局（1990）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河北省組織史資料（1922~1987）》，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2000）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1921~1997）》以及作者收集的簡歷資料整理。

附錄 2 穩健性檢驗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1952~1998 年人均工農 業總產值增 長率	1957~1998 年人均工農 業總產值增 長率	1965~1998 年人均工農 業總產值增 長率	1970~1998 年人均工農 業總產值增 長率	1978~1998 年人均工農 業總產值增 長率
實際政治權力結構					
本地革命力量虛擬變量	1.086*** (0.357)	1.323*** (0.393)	1.953*** (0.451)	3.987*** (0.926)	2.735*** (0.751)
上層政治資源虛擬變量	-0.769*** (0.266)	-0.939*** (0.284)	-1.019*** (0.369)	-2.665*** (0.682)	-1.791*** (0.536)
初始經濟社會指標					
初始經濟水準 (元，對數)	-2.342*** (0.116)	-2.253*** (0.178)	-2.641*** (0.269)	-4.589*** (0.538)	-2.811*** (0.500)
1952 年人口平均受教育年 限	0.099 (0.141)	0.118 (0.146)	0.155 (0.185)	0.280 (0.355)	-0.021 (0.253)
1952 年人均耕地面積 (公頃 / 萬人，對數)	-0.109 (0.389)	-0.013 (0.432)	-0.042 (0.558)	-0.476 (1.009)	-1.039 (0.778)
1952 年人口規模 (萬人，對數)	0.334 (0.396)	0.058 (0.450)	-0.140 (0.494)	0.353 (0.959)	0.449 (0.723)
其他控制變量					
平均海拔 (米，對數)	-0.736** (0.326)	-0.849** (0.403)	-0.729 (0.477)	-1.602* (0.929)	-1.674** (0.732)
到北京的距離 (千米，對數)	0.855* (0.500)	0.342 (0.585)	0.975 (0.688)	0.678 (1.368)	0.245 (0.956)
到天津的距離 (千米，對數)	-1.082 (0.778)	-0.839 (0.842)	-1.735* (1.031)	-1.974 (1.953)	-0.080 (1.507)
是否位於鐵路沿線 (1 = 是, 0 = 否)	0.341 (0.284)	0.211 (0.326)	0.083 (0.412)	-0.105 (0.808)	0.094 (0.599)

是否沿海 (1 = 是, 0 = 否)	-0.293	-0.101	-0.201	0.419	-0.790
	(0.602)	(0.718)	(0.750)	(1.634)	(1.249)
平地面積比例 (%)	-0.029*	-0.033*	-0.030	-0.049	-0.048
	(0.015)	(0.018)	(0.021)	(0.041)	(0.032)
漢族人口比例 (%)	0.035***	0.029**	0.026	0.057*	0.038
	(0.012)	(0.014)	(0.016)	(0.032)	(0.025)
觀測值數	125	128	133	133	134
R ²	0.864	0.705	0.657	0.571	0.437

說明：1. 括號內為異方差穩健的t統計量；2. *表示在10%水準上顯著，**表示在5%水準上顯著，***表示在1%水準上顯著；3. 初始經濟水準分別對應1952、1957、1965、1970、1978年人均工業總產值。

資料來源：詳見「實證檢驗」第一節「模型設定及資料來源」。

附錄 3 政治權力結構與期初社會經濟發展水準相關性檢驗

	模型 1	模型 2
	本地革命力量虛擬變量	上層政治資源虛擬變量
初始經濟社會指標		
1952 年人均工農業總產值 (元, 對數)	0.044 (0.047)	-0.013 (0.095)
1952 年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0.048 (0.029)	-0.013 (0.051)
1952 年人均耕地面積 (公頃 / 萬人, 對數)	-0.266*** (0.088)	-0.045 (0.140)
1952 年人口規模 (萬人, 對數)	-0.047 (0.085)	0.296** (0.118)
其他控制變量		
平均海拔 (米, 對數)	-0.250*** (0.069)	-0.059 (0.120)
到北京的距離 (千米, 對數)	-0.114 (0.143)	0.258 (0.159)
到天津的距離	0.381* (0.143)	-0.207 (0.159)

(千米，對數)	(0.199)	(0.274)
是否位於鐵路沿線	-0.028	-0.401***
(1 = 是, 0 = 否)	(0.071)	(0.092)
是否沿海	-0.329	-0.090
(1 = 是, 0 = 否)	(0.217)	(0.258)
平地面積比例 (%)	-0.009***	-0.004
	(0.003)	(0.005)
漢族人口比例 (%)	0.012***	0.006**
	(0.003)	(0.002)
觀測值數	113	113
R2	0.378	0.215

說明：1. 括號內為異方差穩健的t統計量；2. *表示在10%水準上顯著，**表示在5%水準上顯著，***表示在1%水準上顯著。

資料來源：詳見「實證檢驗」第一節「模型設定及資料來源」。

Endogenous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An Empirical Evidence Look
into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at the
County Level in the Hebei Province from
1952~1998

Wu-Yue You

Lecturer

School of Finance,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Fei-Yue Li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Dong Zha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Lingnan University (Hong Kong)

Ming-Xing Liu

Professor

China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Finance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stitutions good for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are always endogenous to the historical process that it formed. By investigating the conflict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in Hebei, we found that the war shaped the de-facto political power of local elites by shaping their choice of institutions and policy, which then influenced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We also present that the two sides of the de-facto political power had different impacts on the economic growth. County cadres with stronger capacity in collective action and social mobilization due to the strength of military forces would have incentive to protect property rights and withstand the pressure to extract economic resources excessively. However, county cadres with close connections to the higher-level authority due to the distribution of CCP's committees in the warfare area would extract more economic resources, which in turn led to poorer growth performance.

Keywords: Economic Growth, Endogenous Institutions, De-facto Political Power, Historical Process

參考文獻

- 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2000，《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1921～1997）》，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Zhonggong zhongyang zuzhibu, zhonggong zhongyang dangshi yanjiushi, zhongyang dangangan. 2000. *Zhongguo gongchandang zuzhishi ziliao (1921~1997)*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Organizations in Hebei (1921~1997)]. Beijing: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History Press.
- 中共河北省委組織部、中共河北省黨史資料徵集編審委員會、河北省檔案局，1990，《中國共產黨河北省組織史資料（1922～1987）》，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Zhonggong hebei shengwei zuzhibu, zhonggong hebeisheng dangshi ziliao zhengji bianshen weiyuanhui, hebeisheng danganju. 1990. *Zhongguo gongchandang hebeisheng zuzhishi ziliao (1922~1987)*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Organizations in Hebei (1922~1987)]. Hebei: Hebei People's Press.
- 王友明，2006，《革命與鄉村：解放區土地改革研究：1941～1948》，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Wang, You-ming. 2006. *Geming yu xiangcun: jiefangqu tudi gaige yanjiu, 1941~1948* [Revolution and Village: Land Reform in Liberated Areas, 1941~1948]. Shanghai: Shanghai Social Science Academy Press.
- 王文劍、覃成林，2008，〈地方政府行為與財政分權增長效應的地區性差異：基於經驗分析的判斷、假說及檢驗〉，《管理世界》，1：9-21。Wang, Wen-jian, Cheng-lin Tan. 2008. "Difang zhengfu xingwei yu caizheng fenquan zengzhang xiaoying de diquxing chayi: jiyu jingyan fenxi de panduan, jiashuo ji jianyan"[Regional Variations in Local Governments' Behaviour and Effects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Evaluation, Hypothesis and Evidence Base on Empirical Analysis]. *Management World*, 1: 9-21.
- 王賢彬、徐現祥，2008，〈地方官員來源、去向、任期與經濟增長：來自中國省長省委書記的證據〉，《管理世界》，3：16-26。Wang, Xian-bin, and Xian-xiang Xu. 2008. "Difang guanyuan laiyuan, quxiang, renqi yu jingji zengzhang: laizi zhongguo shengzhang shengwei shuji de zhengju"[The Career Paths of Local Cadres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Provincial Governors and Party Secretaries]. *Management World*, 3: 16-26.
- 朱文通、王小梅，2000，《河北通史（民國上卷）》，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Zhu, Wen-tong, and Xiao-mei Wang, 2000. *Hebei tongshi (minguo shangjuan)*. [The General History of Hebei (First Volum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ebei: Hebei People's Press.

- 宋凌雲、王賢彬、徐現祥，2013，〈地方官員引領產業結構變動〉，《經濟學季刊》，1：71-92。Song, Ling-yun, Xian-bin Wang, and Xian-xiang Xu. 2013. "Difang guanyuan yinling chanye jigou biandong"[Local Cadres Leading the Chang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1: 71-92.
- 周業安、章泉，2008，〈財政分權、經濟增長和波動〉，《管理世界》，3：6-15。Zhou, Ye-an, and Quan Zhang. 2008. "Caizheng fenquan, jingji zengzhang he bodong"[Fiscal Decentraliza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Fluctuation]. *Management World*, 3: 6-15.
- 周黎安，2007，〈中國地方官員的晉升錦標賽模式研究〉，《經濟研究》，7：36-50。Zhou, Li-an. 2007. "Zhongguo difang guanyuan de jinsheng jinbiaosai moshi yanjiu"[Promotion Tournament Model of China's Regional Cadres]. *Economic Research*, 7: 36-50.
- 孫海剛，2007，〈市場化進程中的中國地區經濟差距成因研究〉，《財經研究》，33(9)：101-111。Sun, Hai-gang. 2007. "Shichanghua jincheng zhong de zhongguo diqu jingji chaju chengyin yanjiu"[The Causes of the China's Regional Gap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Marketization Progress].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inese)*, 33(9): 101-111.
- 徐現祥、舒元，2004，〈中國省區經濟增長分佈分布的演進（1978~1998）〉，《經濟學（季刊）》，3(3)：619-638。Xu, Xian-xiang, Yuan Shu. 2004. "Zhongguo shengqu jingji zengzhang fenbu de yanjin (1978~1998)"[The Evolution of China's Provincial Growth Pattern(1978~1998)].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3(3): 619-638.
- 寇健文，2000，〈政治繼承與共黨國家政權結構穩定性的比較研究〉，《問題與研究》，39(3)：57-74。Kou, Chien-wen. 2000. "Zhengzhi jicheng yu gongdang guojia zhengquan jigou wendingxing de bijiao yanjiu"[Political Succession and the Structural Stability of Communist Regimes: A Comparative Study]. *Issues and Studies*, 39(3): 57-74.
- 寇健文，2001，〈中共『幹部年輕化』與政治繼承〉，《中國大陸研究》，44(5)：1-17。Kou, Chien-wen. 2001. "Zhonggong ganbu nianqinghua yu zhengzhi jicheng"[The Deannuation of Top Leadership and the Issue of Political Succession in China]. *Mainland China Studies*, 44(5)：1-17.
- 寇健文，2004，〈中共菁英政治的研究途徑與發展〉，《中國大陸研究》，47(3)：1-28。Kou, Chien-wen. 2004. "Zhonggong jingying zhengzhi de yanjiu tujing yu fazhan"[A Study of Chinese Elite 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Mainland China Studies*, 47(3)：1-28.

- 寇健文，2006，〈中共與蘇共高層政治演變的軌跡、動力與影響〉，《問題與研究》，45(3)：39-75。Kou, Chien-wen. 2006. "Zhonggong yu sugong gaoceng zhengzhi yanbian de guiji, dongli yu yingxiang"[The Evolution of the Communist Leadership in China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Trajectory, Dynamics and Impact]. *Issues and Studies*, 45 (3): 39-75.
- 寇健文，2007，〈胡錦濤時代團系幹部的崛起：派系考量vs.幹部輸送的組織任務〉，《遠景基金會季刊》，8(4)：49-95。Kou, Chien-wen. 2007. "Hu jintao shidai tuanxi ganbu de jueqi: paixi kaoliang vs. ganbu shusong de zuzhi renwu"[Cadres Rising in the Era of Hu Jintao: Factional Networking or Organization's Mission]. *Prospect Quarterly*, 8(4): 49-95.
- 寇健文，2010，〈邁向權力核心之路：1987年以後中共文人領袖的政治流動〉，《政治科學論叢》，45：1-36。Kou, Chien-wen. 2010. "Maixiang quanli hexin zhi lu: 1987 nian yihou zhonggong wenren lingxiu de zhengzhi liudong"[Paths to the Top: the Political Mobility of Chinese Civilian Leaders after 1987].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5: 1-36.
- 張平、趙國昌、羅知，2012，〈中央官員來源與地方經濟增長〉，《經濟學（季刊）》，11（2）：613-634。Zhang, Ping, Guo-chang Zhao, and Zhi Luo. 2012. "Zhongyang guanyuan lai yuan yu difang jingji zengzhang"[The Sources of Central Cadres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11 (2): 613-634.
- 張軍、金煜，2006，〈政府間財政改革、金融深化與中國的地區差距：脫落的環節〉，《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1：143-159。Zhang, Jun, and Jin Yu, 2006, "Zhengfu jian caizheng gaige, jinrong shenhua yu zhongguo de diqu chaju: tuoluo de huanjie" [Intergovernmental Fiscal Reform, Financial Deepening, and China's Regional Gap].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1: 143-159.
- 陳玉宇、黃國華，2006，〈中國地區增長不平衡與所有制改革〉，《經濟科學》，1：5-19。Chen, Yu-yu, and Guo-hua Huang. 2006. "Zhongguo diqu zengzhang bu pingheng yu suoyou zhi gaige" [Regional Growth Imbalance and Ownership Reform in China]. *Economic Science*, 1: 5-19.
- 陳華升，2008，〈廣東「反地方主義」運動與派系沖突衝突之分析（1949～1975年）〉，《中國大陸研究》，51(3)：1-36。Chen, Hua-sheng. 2008. "Guangdong 'fan difang zhuyi' yundong yu paixi chongtu zhi fenxi" [Guangdong's "Anti-localism" Campaigns and Factional Conflicts (1949～1975)]. *Mainland China Studies*, 51 (3): 1-36.
- 陶鶴山譯，Friedmand Edward、Paul G Pickowicz、Mark Selden著，2002，〈中國鄉

- 村，社會主義國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Tao, He-shan, trans. Friedmand Edward, Paul G Pickowicz, and Mark Selden. 2002. *Zhongguo xiangcun, shehui zhuyi guojia*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Beijing: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Press.
- 黃信豪，2009，〈晉升還是離退？中共黨政菁英仕途發展的競爭性風險分析，1978~2008〉，《臺灣政治學刊》，13(1)：161-224。Huang, Hsin-hao. 2009. "Jinsheng haishi litui? zhonggong dangzheng jingying shitu fazhan de jingzhengxing fenxi"[Promotion or Departure? A Competing Risk Model for the Career Paths of China's Political Elites, 1978~2008]. *Taiwan Political Science Journal*, 13 (1): 161-224.
- 黃信豪，2010，〈有限活化的中共菁英循環：黨政領導菁英組成的跨時考察〉，《中國大陸研究》，53 (4)：1-33。Huang, Hsin-hao. 2010. "Youxian huohua de zhonggong jingying xunhuan: dangzheng lingdao jingying zucheng de kuashi kaocha"[Limited Renewal within CCP's Elite Circulation: A Trend Analysis on Political Elite Formation]. *Mainland China Studies*, 53 (4): 1-33.
- 黃琨，2006，《革命與鄉村：從暴動到鄉村割據(1927~1929)》，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Huang, Kun. 2006. *Geming yu xiangcun: cong baodong dao xiangcun geju (1927~1929)*, [Revolution and Village: From Violence to Rural Segmentation]. Shanghai: Shanghai Social Science Academy Press.
- 楊海生、羅黨論、陳少凌，2010，〈資源稟賦、官員交流與經濟增長〉，《管理世界》，5：17-26。Yang, Hai-sheng, Dang-lun Luo, and Shao-ling Chen. 2010. "Ziyuan bingfu, guanyuan jiaoliu yu jingji zengzhang"[Resources Endowment, Cadres Circ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Management World*, 5: 17-26.
- 鄒薇、周浩，2007，〈中國省際增長差異的源泉的測算與分析(1978~2002)：基於「反事實」收入法的經驗研究〉，《管理世界》，7：37-46。Zou, Wei, and Hao Zhou. 2007. "Zhongguo shengji zengzhang chayi de yuanquan de cesuan yu fenxi(1978~2002): jiyu 'fanshishi' shourufa de jingyan yanjiu"[The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of the Origin of China's Provincial Growth Gap]. *Management World*, 7: 37-46.
- 趙建民、張鈞智，2006，〈菁英循環或再生？十二大以來中共技術官僚的發展趨勢〉，《中國大陸研究》，49 (2)：69-98。Chao, Chien-min, and Chun-chin Chang. 2006. "Jingying xunhuan huo zaisheng? shierda yilai zhonggong jishu guanliao de fazhan qushi"[Elite Circulation or Reproduction? A Study of the CCP Technocracy]. *Mainland China Studies*, 49 (2): 69-98.
- 劉瑞明，2011，〈所有制結構、增長差異與地區差距：歷史因素影響了增長軌跡嗎？〉，

- 《經濟研究》，S2：16-27。Liu, Rui-ming. 2011. “Suoyouzhijiegou, zengzhang chayi yu diqu chayi: lishi yinsu yingxiang le zengzhang gui ji ma?” [Ownership Structure, Growth Variation and Regional Gap: Did History Influence Growth Pattern?].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S2:16-27.
- 樊綱、王小魯、朱恒鵬，2003，《中國分省市場化指數：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報告（2001）》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Fan, Gang, Xiao-lu Wang, and Heng-peng Zhu. 2003. *Zhongguo fensheng shichanghua zhishu: ge diqu shichanghua xiangdui jincheng baogao (2001)*, [Provincial Marketization Index: Report on Regional Marketization Degree (2001)]. Beijing: Economic Science Press.
- 蔡昉、都陽，2000，〈中國地區經濟增長的趨同與差異：對西部開發戰略的啓示〉，《經濟研究》，10：30-37。Cai, Fang, and Yang Du. 2000. “Zhongguo diqu jingji zengzhang de qutong yu chayi: dui xibu kaifa zhanlve de qishi”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of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Inspirations on West Development Strategy].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10: 30-37.
- Acemoglu, Daron, Davide Cantoni,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12. “The Consequences of Radical Reform: The French Revolu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 (7): 3286-3307.
-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1.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 (5): 1369-401.
-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5. “Institutions as Fundamental Cause as Log-Run Growth.” In Philippe Aghion and Steven Durlauf, eds.,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pp. 386-472. Amsterdam: Elsevier,
- Ahlfeldt, Gabriel M., Stephen J. Redding, Daniel M. Sturm, and Nikolaus Wolf. 2015. “The Economics of Density: Evidence from the Berlin Wall.” *Econometrica*, 83 (6): 2127-2189.
- Alesina, A., and N. Fuchs-Schündeln. 2007. “Good-Bye Lenin (or not?): The Effect of Communism on People’s Preferenc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7 (4): 1507-1528.
- Banerjee, Abhijit, and Lakshmi Iyer. 2005. “History,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Legacy of Colonial Land Tenure Systems in Indi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 (4): 1190-1213.
- Bao, Shuming, Gene Hsin Chang, Jeffrey D. Sachs, and Wing Thyee Woo. 2002. “Geographic Factors and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under Market Reforms, 1978~1998.” *China*

- Economic Review*, 13 (1): 89-111.
- Chen, Baizhu, and Yi Feng. 2000.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Private Enterprise, Education and Openness." *China Economic Review*, 11 (1): 1-15.
- Dell, Melissa. 2010. "The Persistent Effects of Peru's Mining Mita." *Econometrica*, 78 (6): 1863-1903.
- Démurger, Sylvie, Jeffrey D. Sachs, Wing Thye Woo, Shuming Bao, Gene Chang and Andrew Mellinger. 2002. "Geography, Economic Polic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sian Economic Papers*, 1 (1): 146-197.
- Démurger, Sylvie. 2001.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An Explanation for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9 (1): 95-117.
- Dittmer, Lowell. 1995. "Chinese Informal Politics." *China Journal*, 34 (1): 1-34.
- Donnithorne, Audrey, and Nicholas R. Lardy. 1976.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in China's Fiscal Management." *The China Quarterly*, 66: 328-354.
- Donnithorne, Audrey. 1972. "China's Cellular Economy: Some Economic Trends si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52: 605-619.
- Engerman, Stanley L., and Kenneth L. Sokoloff. 1997. "Factor Endowments, Institutions, and Differential Paths of Growth among New World Economies: A View from Economic Historian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Stephen Harber, ed., *How Latin America Fell Behind*, pp.260-30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Fleisher, Belton M., and Jian Chen. 1997. "The Coast-Noncoast Income Gap, Productivity, and Regional Economic Policy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5 (2): 220-236.
- Fleisher, Belton, Haizheng Li and, Min Qiang Zhao. 2010. "Human Capital, Economic Growth, and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2(2): 215-231.
- Iyer, Lakshmi. 2010. "Direct Versus Indirect Colonial Rule in India: Long-term Consequenc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2(4): 693-713.
- Jia, R., M. Kudamatsu, and D. Seim. 2015. "Political Selection in China: The Complementary Roles of Connections and Performanc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3 (4): 631-668.
- Johnson, Chalmers A. 1962.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Kung, James, and Justin Yi-fu Lin. 2003. "The Causes of China's Great Leap Famine, 1959~1961."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2 (1): 51-73.

- La Porta, Rafael,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Vishny. 1997. "Legal Determinants of External Finance." *Journal of Finance*, 52: 1131-1150.
- La Porta, Rafael,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Vishny. 1998. "Law and Fina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6: 1113-1155.
- Li, Hongbin, and Li-an Zhou. 2005.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 1743-1762.
- Liu, Yia-Ling. 1992. "The Private Economy and Local Politics in the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of Wenzhou." *The China Quarterly*, 130: 293-316.
- Nathan, Andrew. 1973. "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53: 34-66.
- Naughton, Barry, and Dali Yang. 2004. *Holding China Together: Diversity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Post-Deng Er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orth, Douglass C.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WW. Norton and Company.
- North, Douglass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orth, Douglass C., and Robert P. Thomas. 1973.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unn, Nathan. 2009. "The Importance of Histor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1 (1): 65-92.
- Oksenberg, Michel, and James Tong. 1991. "The Evolution of Central-Provincial Fiscal Relations in China, 1971~1984: The Formal System." *The China Quarterly*, 125: 1-32.
- Persico, Nicola, and J.C. Rodriguez-Pueblita, Dan Silverman. 2011. "Factions and Political Competi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9 (2): 242-288.
- Shih, Victor, Christopher Adolph, and Mingxing Liu. 2012. "Getting Ahead in the Communist Party: Explaining the Advancement of Central Committee Members in Chin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6 (1): 166-187.
- Wang, Yan, and Yudong Yao. 2003. "Sources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1952-99: Incorporating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China Economic Review*, 14 (1): 32-52.
- Whiting, Susan H. 2001. *Power and Wealth in Rural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Xu, Chenggang. 2011.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9 (4): 1076-1151.
- Xu, Xiaohong, I.P.L. Png, Junhong Chu, and Yeh-ning Chen. 2018. "When Things Were Falling Apart: Tocqueville, Fei Xiaotong and the Agrarian Cause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214959 (August 5, 2018).
- Yao, Yang, and Zhang MUYANG. 2015. "Subnational Leaders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 (4): 405-436.

